

周立昇 著

周立昇文集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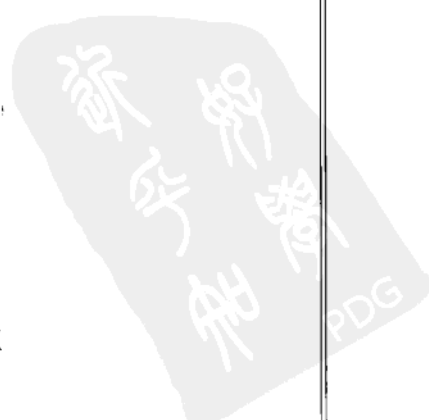
谈易录

周立昇文集(下)

——谈易录

周立昇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立昇文集. 下, 谈易录/周立昇著.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607-4513-8

I. ①周…

II. ①周…

III. ①周立昇—文集 ②周易—研究—文集

IV. ①B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3695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20×1000 毫米 1/16 57.5 印张 12 插页 865 千字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6.00 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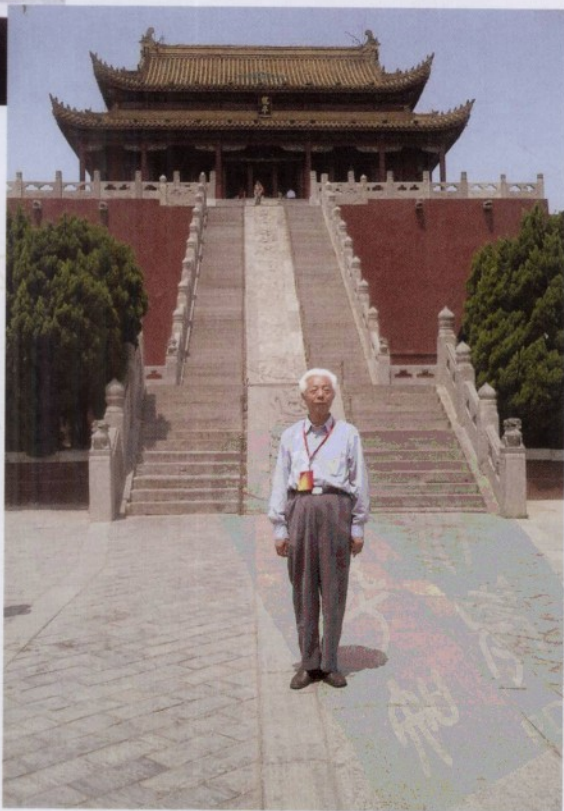
2010 年在“《周易》讲座”演讲



1995 年 10 月在青岛



2006 年在“儒学论坛”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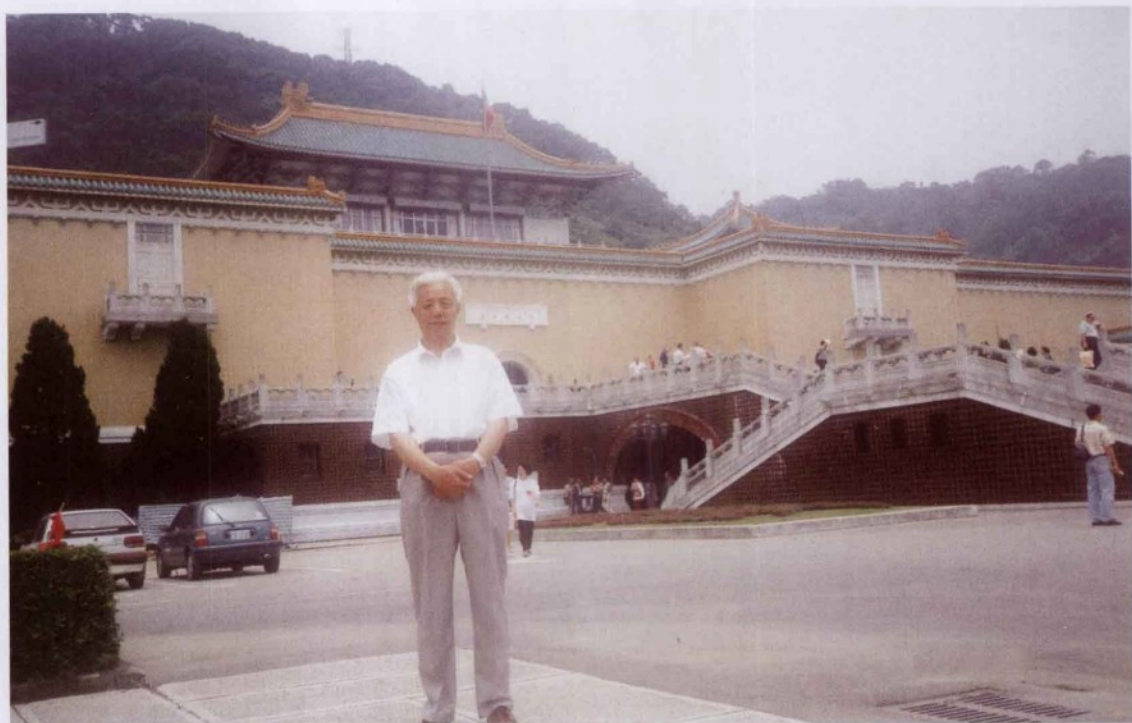
2005 年在开封



2006 年 5 月在蓬莱



1998 年 10 月在西安秦兵马俑大厅



1995 年 5 月在台北



2002 年 4 月在荷兰海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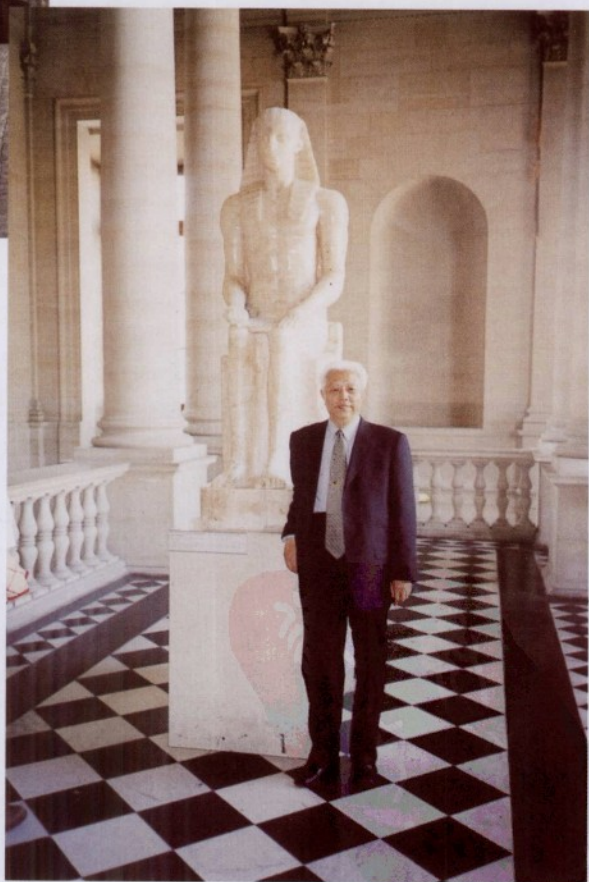
2004 年 8 月在无锡



2002 年 4 月在德国歌德博物馆



2002 年 4 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2002 年 5 月在巴黎卢浮宫

序

周先生是海内外著名学者，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于儒、道、释及百家之学探赜索隐，微显阐幽，有多部著作问世。其早期兴趣在道家，几十年来，集中精力，潜心解读道家典籍。以老庄观老庄，独得老庄之精髓。后转入易学，幽赞而明数，玩辞而存义，以其丰厚的学术见识和深邃而宽广的哲学视野来理解和体悟易道，把易学作为其学术归宿和生命的一部分，虽然现已进入耄耋之年，仍研易不辍，乐而习《易》，以习《易》为乐，真知灼见流于笔端。然而先生易学大作多散见于海内外学术期刊和文集，吾辈后学及海内外学人无法观其全豹，今幸有山东大学出版社将先生十余年研易大作，集结成册，付梓面世，此乃学界一大盛事。先生文集共收集22篇易学论文，内容涉及易学体例、易学史、易学出土文献、易学与道家文化、《周易》经传现代意义等诸方面，后学拜读之，心智开启，受益匪浅，令人赞叹。先生的易学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道家易学的研究

《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既非儒家之作，也非道家之作。然而《周易》文本中有井然有序的符号系统，其最基本的构成是阳爻符号和阴爻符号。

卜筮语境下阴阳符号是筮占活动中的记号或标识，其意义通过附在这些符号之后的文辞而表现出来。它是卜筮不可缺少的、判定吉凶福祸的依据。而脱离卜筮语境的易文本阴阳符号，成为两种对待互补、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一为阳刚，--为阴柔。它作为后世解释的对象，见仁见智，成为先秦崇刚的儒家和贵柔的道家共同遵循的文本。孔子及其后学虽然可以依据儒家的立场，对于易符号作更多的解释和阐发，但绝不是脱离文本任意的解读，而是必须受到文本的制约。换言之，只有从内涵儒、道两家意义的易符号出发，选择儒道相关的概念、思想，才能作出创造性的理解和解释。这是《易传》之所以能够包容道家 and 后世道学之所以把《周易》作为自己的经典以及儒、道两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互融共存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汉以后，儒、道两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虽有对峙、碰撞、冲突现象之发生，但二者通过易学作为桥梁互渗、互融、共存，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学术趋向，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的形成则是明证。周先生基于儒与道、《易》与道这种特殊的关系，以道学观两汉易学和以易学观两汉道学，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思想。如提出“汉初的儒学者如陆贾、韩婴等人，将黄老之学与儒学融合。他们的《易》说或《易传》明显地在以黄老思想说《易》”。“孟焦京一系之象数易学，实有道家的隐士所传”。扬雄《太玄》会通易老，郑玄、虞翻以老解《易》。同时，分析了《淮南子》的易道观，阐述了《韩诗外传》以黄老解释《易传》，《周易参同契》“运用汉代象数易学推阐还丹之理”，并将两汉与易学相关的道学典籍称为“道家易”。其中许多见解与论述，发前人所未发。易学史上，由于《周易》因孔子整理和解释而于汉代立为官学，儒门学者多把儒家易学视为“正宗”，竭力拔高；而把道家易学视为“别传”，大加贬低。固然，儒家易学在历史上是主流易学，在易学典籍整理、易学文化传播和易学研究等方面的确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但由此而否定道家或道教在易学发展中的作用，显然是门户之见。周先生从儒、道两家的关系入手，探讨易学与道学的关系，阐述道家易学思想的内涵及其在易学发展史中的作用，对于重新确立道家在

易学中的地位、廓清学界长期以来的误解、推动道学深入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象数易学研究

按照《易传》解说，卦爻符号不仅是人们用于占筮的标记和判断吉凶的依据，也是系辞的重要依据，即“观象系辞”。既然卦爻辞本于卦象，表达卦象的意义，那么理解和诠释卦爻辞，揭示系辞依据，探寻象辞之间的联系，不失为解《易》的一种合理的方法。汉儒得在于此，失也在于此。具体言之，汉儒以《易传》为据，引而申之，形成了内涵自然科学的象数易学理论和一套系统的象数解《易》方法，象数易学成为专门之学。然而他们的问题在于极力夸大象数符号在卦爻辞形成中的作用，主张《周易》中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并非圣人随意而作，皆源于象数符号，最大限度地开显《周易》文辞背后的象数，不遗余力地探求其卦爻辞与卦爻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汉代象数易学理论上表现为偏于天道而内涵自然科学的、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的天人之学，方法上则表现为把象数奉为主臬、专以象数解《易》，其形式则多流为繁琐、支离。由于汉代象数易学具有繁琐、晦涩、神秘的特点，加上大多资料遗失，故象数易学研究始终是易学研究的难点。虽然经过清儒对汉代复杂象数的整理、解读、阐发，但仍有许多难解之谜。周先生从上个世纪90年代始，致力于象数易学研究。通过认真地解读《春秋左传》、《国语》易学资料，追溯象数易学源头，阐明了春秋易象的特点、运用及体例等问题，指出了春秋易象为《易传》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又以唐代李鼎祚《周易集解》中所保留的汉代象数易学资料为依据，对汉代象数易学的主要人物如孟喜、焦延寿、京房、扬雄、郑玄、荀爽、宋衷、虞翻及明代来知德等易学家复杂的象数体例和思想作了极为系统的梳理和准确的解析，并就每一位易学家作出客观的、历史的评价。更为可贵的是，周先生把象数之学置于整个哲学视域之下，透过复杂的易

学体例审视易学家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如对春秋易象的哲学解读，发现其相当浓厚的哲学意蕴，即“生动的直觉思维”、“深沉的理性之光”和“符象意的辩证发展”。又从汉代易学家象数体例中，绌绎出汉人独特的易学天人观和思维方式。分析春秋易象的哲学意义，在学界当属首次。而探索汉代象数的哲学意义，早在上个世纪就有之。上个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书的牟宗三先生撰《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函义》一书，以怀特海哲学概念和观点解读汉代象数易学，提出汉代象数易学是一种自然哲学，旨在构建一个中国式的自然哲学体系，虽使当时学界耳目一新，但却有全盘西化之倾向。与牟宗三不同的是，周先生未简单地用西方哲学概念观点比附象数易学，将汉代象数易学西化，而是运用西方的哲学思维分析出汉代独特的易学哲学，这不能不说是从前人的超越。

三、新出土文献研究

20世纪震撼易学界的大事，就是一大批易学文献的出土。甲骨文、金文中的数字卦的发现，湖南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湖北荆州王家台秦简《归藏》、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相继出土，还有以记录卜筮为内容的湖北江陵天星观战国简、湖北荆门包山战国简、河南新蔡葛陵战国简陆续公布，为易学史、易学文本、易学思想和易学筮法等问题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宝贵的资料。上世纪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数字卦的发现、帛书《周易》经传的公布。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张政烺先生就考古出土的周初金文和甲骨文的数字符号发表论文，提出这些数字符号是数字卦，进而探讨了数字与《周易》符号、数字卦与筮法、数字卦与《连山》之间的关系，引起整个考古界和易学界的轰动，学者纷纷撰文探讨数字卦及其相关的问题。对于是否有数字卦，学界虽然有不同的声音，但是新出土的战国简（如湖北江陵天星观简、湖北荆门包山简、河南新蔡葛陵简）有两组数字和筮辞，则被认为是数字卦

的一个重要的证据；西安西仁村陶拍上的数字排序与今本《周易》师、比、小畜、履、既济、未济一致，再次被认为数字是卦的又一重要证据。马王堆《周易》不同的卦序和文辞，从未见过的《要》、《衷》、《二三子问》、《繆和》、《昭力》五篇传文及不同于今本的《系辞》，令学界耳目一新。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周易》文字和文本的流传，重新检讨孔子易学和《易传》版本、成书等问题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周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高度自觉的学术敏感，结合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和民族学、民俗学，系统地探讨了数字卦及其相关的问题。在承认数字卦的前提之下，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刻纹图案，“有可能是原始筮占的数字记录”。由此大胆推断：伏羲时代已有原始数字筮占。进而比较了原始数字与商周数字的异同，论述了商周数字卦与《连山》、《归藏》、《周易》的关系，提出“契数为卦，不仅有《连山》的踪迹，而且也有《归藏》的踪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其逻辑进程应为原始筮占→《连山》→《归藏》→《周易》”。而对于《周易》与筮数关系，主张《周易》符号形成经历“筮数的简化过程”和“筮数符号化过程”两个阶段。同时，对于数字转化为阴阳符号，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如他说，爻画“—”是由筮数一变来的，并非由筮数九变来，对此必须从龟卜和著筮的生数及成数去理解，龟卜用生数一至五，著筮用成数六至九，一是生数始，九是成数终，终而复始，一九相通，故爻画—从筮数一来，而今本曰“用九”，帛书曰“迥九”。先生说，“迥”疑为“通”，一九相通。此说有理有故，自成一家之言。他不仅以考据方法印证和深化了张政烺先生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以独特的哲学家眼光理性地去分析透视数字卦到《周易》定型的哲学意义。如他认为“筮数的符号化，使《周易》在形式和内容、结构和功能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它不仅具有一般筮书的共性，而且还呈现出它自身所独有的特性”，进而详细地分析了卦爻画的有序和经别卦规范化（即框架结构的规范化）、要素规范化的特征。特别指出，《周易》框架结构的规范化具有整体性、和谐性、通变性的特点，要素功能的规范化具有表象、运数、明理、筮占的特点，从而将象、

数、理、占四者一体化。又如他认为：“筮占是人类思维发展史上所表现出的一种特殊形态。”“从总体来看，它不是哲学，也不具备哲学的形态，但是，它却曲折地表现了人类在幼年时代试图探寻和努力掌握客观事物因果联系的一种尝试。”这样一些哲学的分析和阐发，反映出先生敏锐的哲学思维和丰厚的知识学养。这是当时一般学者所未及的，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反响。

在帛书《周易》六十四卦公布后，周先生立足于这一学术的前沿，发表《帛〈易〉六十四卦刍议》一文。周先生通过比较帛本与今本《周易》，就帛书《周易》卦序、重卦、成象、卦爻辞等问题发表许多极有价值的见解。如他提出：阳大阴小、阳先阴后，就是帛书排列卦序所依据的原则。“由帛书六十四卦可知，原来八经卦作为上卦，按阳先阴后的原则排列”，“而下卦则以对立统一的原则”，“依次和八上卦组合，从而得出六十四卦来”。“今本的卦序是经后人重新编排的”。而“帛书六十四卦的成象是自上而下，并非自下而上”，并以大量事实为据，提出“帛《易》六十四卦无卦名”，“帛书卦爻辞优于今本者”。他指出，“帛书在抄定过程中也有错抄、漏抄和抄重”的现象，“尽管帛书有许多小疵，但是瑕不掩瑜。我们用帛书可以校勘通行本的许多纰缪，并可纠正后世周易家某些望文生训的错误，帛书的这一价值是非常珍贵的”。这些见解，在当时可谓真知灼见，发人深省，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帛书《周易》六十四卦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周先生是鄙人最敬重的大学老师之一。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国哲学史，当年授课时给我们的最深印象是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度的责任心和渊博的学识，同学们由此而对先生产生崇敬的心情，说来虽已过去三十余年，但至今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今有先生大作付梓出版，蒙先生之厚爱，嘱托后学作序，后学深感才学疏浅，诚惶诚恐，岂敢造次！一再辞让，然先生如此谦和而执著，恭敬不如从命。故以拜读先生大作之感想，概说先生易学研究之成就，以上所言妥当与否，还请同道及学界朋友指正。

后学林忠军于山东大学
2010年10月

自序

—

《周易》这座玄奥而神秘的殿堂，人们多闻而生畏、望而却步。打开号称“天书”的《周易》，映入眼帘的乃是八卦、六十四卦卦象和爻符，以及与这些卦象、爻符相关联的卦辞和爻辞。卦象又称“卦画”，由“—”和“--”两种符号构成，极具抽象性和变化性。卦爻辞则系于卦爻象之下，极其晦涩难懂，有些地方难晓其意，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确解。

关于《易经》的时代和作者，一直是易学史上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照传统的看法，《易经》的制作，大致经历了画卦（八卦）、重卦（六十四卦）、系辞（将繇辞分别系于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之下）等阶段。传统易学认为，画卦的是伏羲（《系辞传》中首次出现，相当于原始社会的中期），重卦的是文王。古人多信而不疑，而今人则疑而不信。

关于卦爻辞的作者，唐以前主要有两种说法：或认为卦辞、爻辞均为文王所作，司马迁、郑玄并依此说；或认为卦辞乃文王作，爻辞乃周公作，贾逵、马融、虞翻、陆绩等并同此说。（参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序》）

近现代以来，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以新观点、新方法研

究《周易》的学者，他们有的对《周易》做出了新的阐释，有的利用考古新资料予以重新审视，有的在易学古文字训诂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了一股辨伪、疑古之风，《易经》的成书年代成为热点问题，有的主周初说（顾颉刚），有的主周末说（李镜池），有的主春秋说（陆侃如），有的主战国说（郭沫若），等等。对于卦爻辞，也否定了文王和周公的所有权，认为是根据历年积累的筮辞，经过整理、加工、编纂而成的，并非一人一时所作。80年代，由于考古发掘的新资料，特别是对周原契数卜甲的研究，张政烺先生率先提出了契数与易卦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讨论。对“数字卦”的研究，进一步剥去了易卦的神秘面纱，为探索易卦的起源和演变，为深入研究《周易》的前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当然，“数字卦”问题目前尚待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不过由它的引发，关于《易经》成书于殷末周初之说再次受到重视。我们似乎可以对《周易》的卦画爻符及卦辞爻辞的制作作出如下推断：

远在氏族社会伏羲时代的上古时期，人们即以数字作为筮兆占问吉凶了，后来则用八卦、六十四卦的筮兆从事占筮活动，甚或还附有简单的筮辞。到了殷末周初，当时的太卜或太史对巫覡所积累的占筮记录加以筛选、整理和补充，最后编订成为卦爻画比较规正、卦爻辞比较顺通的《周易》古经。时当殷末周初之际，约公元前11世纪的中古时期。

关于《易经》的时代和作者，有许多问题并未搞清。因此，我们仍然需要从诸方面对它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二

《周易》经传，按传统易学，有一套系统的观念，即“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汉唐时代的易学家们每每视为不易之论，特别是对孔子作《易传》，更是不能怀疑。直至北宋欧阳修对《易传》予以考